

1934年毛泽东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摇摇红军在成立之初，就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困中艰难发展的。在敌人频繁的“会剿”和围困中，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特别是个别党的高级干部也表现出右倾悲观思想。在古田会议召开的前夕，当时任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竟然主张把红四军分散开来打游击，公开表露了他的右倾思想。由于当时正忙于筹备召开古田会议，而后又忙于部署对付敌人的“三省会剿”，毛泽东没有立即回复林彪的信。1934年11月15日，古田会议已结束，红军部署也已完毕，毛泽东对当时革命斗争中的重要问题也已考虑成熟，于是就时局和革命的性质、前途问题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毛泽东不但批判了党内林彪等人的右倾悲观思想，主要是深刻地阐发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伟大理论。这篇文章也标志着毛泽东的“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形成。

信中毛泽东写道：“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11月15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这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悲观动摇是早有察觉的。毛泽东对这一问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毛泽东认为林彪的这种思想根源于：“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总结了井冈山、赣南和闽西斗争经验，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其中心内容有如下四点：

首先，他指出，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它们支持各派军阀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压迫剥削。为了各自的利益，各派反动军阀之间必然要进行激烈的争夺，于是出现连年混战的局面。这就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一方面，军阀混战都以城市为中心，从而使革命力量不可能在城市中立足；另一方面，广大农村成为反动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给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发展存留了空间，从而产生了“一件怪事”，“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了“城市中心”论，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其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他在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

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也说明了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第三,他指出,中国社会矛盾的向前发展决定了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作了精辟的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对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工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

第四,他指出,红色政权的建立是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并对中国革命具有远大的意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的问题,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敌人所击败,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条件下的革命发展规律。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圆 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电报战

在国民党新军阀中,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系的致命打击,惟有阎锡山的晋军回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得到了保存和发展,这成了蒋介石心中最大的心病。而阎锡山亦清楚蒋阎之争绝不可避免。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八日,吴铁城衔蒋之命到山西,要求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手续。这显然不只是一个手续问题,而是蒋要阎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但阎怎情愿屈服于蒋介石,他借这个机会在宣誓仪式上,把蒋痛骂了一顿,阎斥责蒋造成党的分裂、国家分裂、军人混战割据的局面。蒋介石更不甘示弱,在调重兵的同时,警告阎:“军队必须始终服从中央,否则,要戡乱定变,铲除封建势力。”

此后,蒋阎之间开始了相互攻击的“笔战”,并发展为措词非常激烈的电报战。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八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称“武力统一,不然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于民主党治天下”。以“礼让为国,在野负责”为名,要求与蒋共同下野。

阎电发出之后,得到了反蒋派的一片喝彩,同时也得到了蒋介石及其亲信的一片责难。

八月八日,蒋介石电复阎锡山,拒绝阎下野要求,并宣称“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八日,阎复电蒋介石,再次要求蒋“共同下野”,并责蒋“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完成？”

圆月 员缘日，受蒋控制的行政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长胡汉民和司法院长王宠惠联名电阎，责以不顾党国纲纪，谓“国有纲维，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同日，反蒋派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致电阎锡山，对阎蒸（员园日）电大加称颂，谓“顷诵蒸电，促蒋下野，以谢国人，欣具同心，无任感佩”。

圆月 员远日，蒋介石发表《告诫军人书》，宣称“称兵作乱，反抗中央者，谓之叛变，亦即谓之内乱”，从而向所有反蒋派提出警告。同日，阎锡山电复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公开表示蒋在野负责，于党国无害。翌日，阎又复电谭、胡、王，提出组织元帅府或机枢、元老等院以镇乱，而实现在野负责之主张。

此时的蒋介石，一面与阎打电报战，一面依恃中央权力，调兵遣将，决定以军事压阎。圆月 员愿日，阎锡山因闻蒋介石已下令动员，问罪晋冀，急电蒋，声明无负蒋之心，无须劳师动众，一纸命令，无不服从。但在同日，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再次电阎，谓“在野与负责二事势不能两可”。陈铭枢是日亦通电斥阎“发矢无的，在野救国，理复何居？”圆月 员怨日，蒋介石则公开电斥阎锡山“以礼让为名，争夺为实”。并要求阎“首践请焕章出洋之约”。

圆月 圆园日，阎锡山电复蒋介石，称“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必一齐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

至此，阎蒋两派围绕蒋下野问题电报往复多次，各执一词，互责对方。而此时拥阎反蒋派已按捺不住斯文，决定用强势压蒋。圆月 圆园日，鹿钟麟等阎系将领通电反蒋，并推戴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圆月 圆员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将领通电援阎，并要求蒋自动下野，以谢国人。是日国民党广东省各级党部也通电响应阎蒸电精神，斥蒋恃暴力以为统一由我，征伐自专，必将不戢自焚。圆

1945年的故事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月 猿日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领衔各方反蒋将领 濠人通电反蒋。

圆月 圆原日 ,汪精卫电复阎锡山 ,极力赞成阎提出的全党投票主张。

蒋介石也于 圆月 圆原日致电阎锡山 ,称三届中央是三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中央 ,反对三全中央即为党国叛逆。

猿月 员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 ,决议开除汪精卫党籍 ,查处阎锡山。

至此 ,蒋阎关系剑拔弩张 ,不战不足以解决矛盾。并终于在缘月爆发了蒋阎冯中原大战。

猿摇海牙会议批准“杨格计划”

猿猿年 员月 圆日 海牙会议通过了“杨格计划”。这一“计划”主要是解决一战后德国赔款问题和协约国从莱茵区撤军问题。在 猿猿年 曾通过了“道威斯计划”，它仅仅规定了德国每年的赔款数额，对赔偿的总额和偿付年限都未加限制，因此没能彻底解决德国赔款问题。从而，制定新的赔款计划的需要就成为必要了。

制定新赔款计划的要求首先来自德国。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的经济逐步恢复起来，猿猿年工业生产达到战前水平，猿猿年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与此同时，德国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改善，参与签署《洛迦诺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并加入了国联。随之，德国谋求修改“道威斯计划”。

德国的要求得到美国支持。美国是德国的主要债权国。猿猿年至 猿猿年德国工业投资 猿猿亿马克，其中 猿猿多亿马克为外国贷款，而外国贷款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希望德国经济稳定，支持德国的要求，但反对把赔款问题同战债问题联系起来。英国同意重新考虑赔款问题，条件是必须减免战债，若美国不减免战债，英国从德国索取的赔款就不得少于它向美国偿还的战债。法国和意大利的观点同英国相似。猿猿年 猿月中旬，德国签订在新计划下款付的赔偿将足以使协约国偿债，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诺解除协约国对莱茵河左岸的占领。这样，德国赔款问题才被提上日程。

猿月底，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和德国就建立专

家委员会一事达成协议,并决定吸收美国专家参加专家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拟定关于德国赔款问题完整的和最终的解决办法。“道威斯计划”的制定者之一、美国摩根财团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欧文·杨格被任命为专家委员会主席。

1920年10月,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始工作。德国代表沙赫特提出,德国无力每年支付10亿金马克,要求削减偿付数额。美国对此表示支持,但遭到法国和比利时的反对。于是,杨格建议削减英国应得的赔款份额,用以增加法、比、意所得份额。经过几个月的争论,11月1日,杨格委员会制定出德国赔款问题的新方案,即“杨格计划”。其主要内容是:(1)赔款总额为100亿马克。(2)赔偿期限为15年,分10个阶段。自1921年12月1日至1936年11月1日,平均每年偿付赔款10亿马克,此后10年中,每年的赔偿数额等于协约国每年向美国偿还战债的数额。(3)赔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不能延期支付,另一部分在德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可延期支付,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4)由美、英、法等国组成国际清算银行,以代替根据“道威斯计划”而设立的赔偿委员会及其它机构。该银行行使征收和分配赔款的职能,并在德国经济不景气时提供援助。(5)赔款来源于德国铁路收入和国家预算。(6)赔款兑换为外汇的责任,改由德国政府负责。

“杨格计划”减轻了德国的赔款负担,取消了对德国的财政管制,有利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1920年12月1日,讨论“杨格计划”的国际会议在海牙召开。与会国共10个,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葡萄牙。会议设财政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前者讨论德国赔款问题,后者讨论协约国从莱茵区撤军问题。在财政委员会会议上,英国财政大臣斯诺登建议重新研究杨格计划规定的赔款分配方案,反对削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减英国获得的赔款数额,法国则主张完全接受“杨格计划”。英国拒不让步,法国只好考虑英国的要求。与此同时,政治委员会就提前从莱茵区撤军达成协议,规定英、法、比军队自1925年12月至1926年12月从莱茵区全部撤出。1925年12月17日,与会各国签署一项议定书,原则上同意“杨格计划”。1926年1月14日,海牙会议举行签字仪式,正式批准“杨格计划”。

源 苏联消灭富农阶级

1929年1月10日，联共（布）中伏尔加边区委员会就通过决议，要求在1月15日以前消灭反苏维埃政权的富农活动分子，1月15—15日完成驱逐属于第二类富农1万户的任务。为了贯彻边区党委的这项决议，在各州和各区的党委会下面设立“战斗司令部”，以指挥消灭富农阶级的“战斗”行动。其他地区的党委会也都通过了消灭富农阶级的类似决议。

1929年1月15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发表《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说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

1929年1月15日，斯大林作《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发了。”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呢？斯大林回答说：“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斯大林的讲话是对能不能让富农参加集体农庄问题讨论的最终裁决，标志着从限制和排挤富农阶级政策到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急剧转变。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最新讲话的精神,1929年1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1月18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1月20日,政治局用电报将决议发给各地党组织。决议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废除关于租佃土地、使用雇佣劳动等法律,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牲畜、经营用建筑物、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子储备等等。

决议关于具体处置富农的规定是:反对革命富农的活动分子、恐怖活动和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属于第一类,应立即逮捕,押入劳改营,其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应处以极刑;反对集体化运动的大富农、从前的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当从全盘集体化地区搬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及北方地区;剩下大多数属于第三类的富农户分别迁到本地区专门划出来的、在集体农庄以外的地段。

1929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又作出《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立法程序上确认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2月19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用电报发给各地苏维埃政府。指令估计:第一类富农为远万多户,第二类富农为1.5万户,第三类富农约1.5万户。

于是,对富农阶级实行“扫地出门”的消灭措施,在全国掀起一场暴风骤雨般地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而且都把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先消灭富农阶级,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萨拉日斯基的梁比尔斯克村苏维埃对农村全盘集体化问题的精神并没有领会,可是村苏维

1929年的故事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埃主席团就在1928年11月底决定,没收本村愿户富农的财产。圆月初召开村苏维埃扩大会议,就没收这愿户富农财产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在这以后,才在全村大会上提出全盘集体化问题。麦尔查平斯克村苏维埃也是先在小范围的贫农会议上研究了没收富农财产问题,并立即作出决定:“没收富农财产,归将来的集体农庄所有。”当作出没收富农财产的决定时,全盘集体化尚未着手进行。

揭露和打击第一类富农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执行。驱逐第二类富农由所在的村苏维埃提出名单,由所在的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并委托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执行没收富农财产的义务。安顿第三类富农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确定。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定在3个月内再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1000名党的负责工作者下乡。

1929年春天,在西伯利亚有1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被划为第一类富农的有10万户;在北高加索有1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被划为第一类富农的有10万户;在伏尔加河中游有1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被划为第一类富农的有10万户。

在1929年的一年内,全国有10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有近100万户富农被迁往北部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有近100万户富农逃亡到工业中心和城市里去“自我消灭”。到1929年年底,估计全国的富农户已不超过100万户。

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以后继续执行。到1930年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0万户。到1931年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10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缘起伦敦海军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虽然在 1919 年至 1920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对各西方主要国家英、美、日、法、意等国的主力舰和航母的吨位比例进行了限制,但对巡洋舰和其它舰的建造方面却未加限制。于是,各国在未加限制的舰只方面展开了竞赛。为解决海军军备竞赛中产生的矛盾,1923 年 1 月 17 日,英政府向美、法、意、日四国发出举行伦敦海军会议的邀请。英政府的这一做法是为了维护英国当时海上霸主的地位。此前,英、美、日三国在日内瓦曾举行了一次海军会议,但由于英美两国在巡洋舰问题上分歧很大,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923 年 1 月 17 日,第一次伦敦海军会议召开。英美之间在开会之前已经达成默契,会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的比率上,美日双方僵持不下。法国和意大利在会议上由于地中海权益划分方面频繁发生冲突,两国之间也始终没能达成谅解。后来美国和日本都作了让步,在 1 月 20 日通过了以美国方面的妥协方案为依据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作为华盛顿会议上《五国海军协定》的补充。条约主要规定:英、美、日三国拥有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吨位比例为 1:1:1;重巡洋舰的吨位比例为 1:1:1;潜水艇的吨位,英国保持相等水平,超过限额者应于 1926 年 1 月 1 日以前予以处理。还有一项例外条款规定,如果英国认为自身受到别国增强海军力量而受到了威胁,则英国可以相应增强其海军实力。法国和意

1914年的故事

意大利政府拒绝批准这项条约，只承认个别条款，因此条约仅在英美日三国间有效。1914年12月，在伦敦举行了英美日交换条约批准书的仪式。但条约实际上并未阻止三个海军强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随后，美日矛盾渐趋突出，两国相继实行新的造舰计划，并各自在太平洋上举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

选第一个“印度独立日”

1947年 1月 印度国大党在拉合尔举行的年会上,贾·尼赫鲁被推举为主席。他在致词中说:“独立对我们意味着从英帝国主义手中获得完全自由。”大会在激昂的气氛下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和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决议。大会授权予甘地领导这个运动,并决定 1947年 1月 15日为“印度独立日”。大会为独立日制定的《独立誓词》中指出,自由是印度人民不容侵犯的权利,如果政府剥夺了这种权利,人民就有权打倒这个政府。“英印政府不但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这种权利,而且以剥削印度人民为基础,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蹂躏着印度,因此,我们必须同英国政府断绝关系,完全独立。我们认为,争取自由的最有效方法是非暴力。”《誓词》表明了争取独立的决心和反帝运动的特点。

1947年 1月 15日,群众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运动开始了。孟买十五万群众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来纪念独立日。他们的口号是:“印度属于印度人!”“革命独立万岁!”“非暴力万岁!”国大党领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一位名叫恰托巴达亚的妇女,勇敢的排除警察干扰,把一面国旗升上国大党办公楼上。这一天,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宣读《独立誓词》,形成了自 1947年以来最大的反帝运动。

庆贺独立日的活动,促进了甘地迅速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决心。1947年 1月 16日,他公布了十一条行动计划。第一条,把卢比的兑换率降低到一先令四便士;第五条,实行保护关

税,限制外国布和服装进口;第六条,给印度商船以沿海航行权。这条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二条,降低田赋,首先有利于地主,同时也反映了农民的愿望。第七条,撤销暗探局,或将它转交社会监督;第十一条,释放全部政治犯,准许被逐的政治犯回国,反映了广大爱国阶层的要求。第九条,废除政府的食盐专卖和盐税,关系到城乡劳动人民起码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第四条,减少英国官吏薪金,反映印度职员的情绪。第十条,禁止制造、贩卖烈性酒类,涉及一般社会问题。综观十一条中,没有提印度独立问题和手工纺织运动问题。它集中反映了一般的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要求,主要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纲领。甘地特别强调“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的原则。他想通过这十一条关系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把广大印度爱国阶层吸引到公民不服从运动中来。

英国殖民统治者顽固拒绝十一条要求,不向国大党作任何让步。于是,甘地宣布在全国开始大规模群众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这次运动的基本方面,如不服从殖民当局法律、放弃职务、罢课、抵制英货、拒绝纳税等,都同上一次不合作运动相同。这次运动是在国大党已拥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青年学生广泛支持的基础上发生的。劳动群众的反帝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国大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农群众中做了大量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工作,同时竭力阻止反帝斗争转为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1930年1月30日,甘地挑选了20名信徒,开始了为时7周的、从阿麦达巴德到丹地取海水制盐的“食盐进军”。这次前往西海岸的进军,行程共240英里,他们边行走、边宣传,每到一地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沿途农村都挂起国大党党旗。甘地在欢迎大会上讲话,号召农民参加公民抵抗运动,遵守非暴力原则。有100多个村长自动放弃了职务,更多的农民参加了进军的行列。警察对和平进军者进行残酷的殴打。但即使在木棒枪